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中琉关系
研究丛书
04

ZHONG LIU GUANXI YANJIU CONGSHU

明清时期 MINGQING SHIQI
ZHONGLIU YOUHAO GUANXI
LISHI YICUNKAO
中琉友好关系
历史遗存考

孙清玲◎著



海洋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42)资助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YJC70079)研究成果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

中琉关系研究丛书④ 主编 谢必震

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 历史遗存考

孙清玲 著

海洋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考/孙清玲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5

(中琉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27 - 7870 - 5

I. ①明… II. ①孙… III. ①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琉球 - 明清时代 IV. ①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065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11.75

字数:240 千字 定价:38.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言

古代琉球是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中国的史籍中早有记载，称之为“流求”、“流虬”、“瑠求”或“琉球”。学术界认为，明代的史籍中关于琉球的记载，通常指的是今天的日本冲绳地区，即真正意义上的琉球国。明以前的史籍中关于琉球的记载，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有的指琉球古国，有的指台湾。但不管怎么说，自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杨载持诏谕琉球，诏曰：“……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住谕，尔其知之。”^①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中琉友好交往。

明清两朝中国与琉球的交往是以福建为舞台的，迄今仍留有许多的遗存：福州琉球墓园，福州琉球馆，琉球人捐资修建的福州尚书庙和天后宫，福建长乐梅花的琉球蔡夫人庙，福州南台建造册封琉球船场遗址，使琉球时祭祀的天后宫（怡山院），福州乌山、鼓山册封琉球使者留下的碑刻，在福州、闽侯和长乐等地的册封琉球使臣的坟墓……

除了福建外，与中琉友好交往的遗存还有很多，在今天的日本冲绳地区，在福州到北京的贡道上，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也有琉球人活动的遗迹、遗存和遗物。

在过去的中琉关系研究中，人们注重文献资料的运用。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的学者，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共同整理出版了7册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为中琉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日本相关的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长年累月地整理和搜集有关琉球古国的史料，尤以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最为突出，他们自1988年以来，修订整理琉球的《历代宝案》，极大地推动了中琉历史关系的研究。

此外，中日双方的学者还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日本方面组织了“那霸—北京三千里踏探”，许多学者、学生，沿着中琉友好交往的使者们的行程，考察历史，探询学术上的疑问，增进了中日两国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甲子”条，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之间的友谊。

事实上，日本学者也注意到中琉友好遗存的考察研究，近年来，日本琉球大学的高良仓吉教授和日本冲绳那霸市史编辑室的田名真之，共同考察了中琉历史交往的各个地区，诸如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河北、北京等，对各地有关中琉交往的历史做了有意义考察，并出版了考察报告和大量的图片。曾任日本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比嘉实教授，也在著名的中琉音乐比较研究专家王耀华教授的陪同下，完成了福建至北京的贡道考察，以“唐旅之行”为名，发表了他的考察报告，记述了沿途考察的历史痕迹和心得体会。日本琉球大学法文学部教授上里贤一，集他多年在福州地区考察的成果，著有《闽江流域闻见录》，介绍了他在福州地区有关中琉关系历史的所见所闻。日本冲绳大学金城正笃教授也完成了他的学术大作《从冲绳到中国》，客观地叙述了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以及今日所面对的许多现实问题。上述学者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中琉关系史的研究，学者们不仅注意到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也注重中琉历史遗存的研究。不过，若是我们细心一点回顾这段的学术研究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最早注重研究中琉友好历史遗存的，应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

1947年，当时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供职的傅衣凌先生及其同人，在福州水部河口和仓山望北台一带进行了三次考察，一共发现和摹拓了四块石碑，并写成《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历经战乱，当时的柔远驿（俗呼琉球馆）仅存大门。四块石碑，其一为同治十一年（1872）福州南台海防分府给立，碑文内容是严禁附近居民进入琉球馆内滋事生端。另外两块石碑，一为道光十九年（1839）所立，一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立，其碑文内容与河口琼水球商天后宫相关。据其所载，道光三年（1823），专门从事中琉贸易的琼水球商出资，在琉球馆附近兴建了一座天后宫，并置办了专门的田房产业，以供香火和修葺之用。道光十四年（1834）天后宫被大水冲毁之后，琼水球商重新鸠资拓建，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立的石碑即董事赵广利等，通过县衙公示，重申天后宫的公共产业不可侵犯。而道光十九年（1839）所立的石碑，则主要叙述了天后宫边上的小河，由于附近居民乱弃秽物，以至河道淤塞、恶臭熏天，赵广利等人只好借助县衙告令禁止之事。第四块石碑为道光二十年（1840）福州南台海防总捕分府给立，碑文是官府要求当地居民保护琉球人墓地的告示。

这篇《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以后收入《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

一书^①。傅衣凌先生等人的深入调查工作，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而且为之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963年，在刘蕙孙先生的指导下，徐恭生教授和李茂忠先生一道对福州仓山地区的琉球墓进行细致的考察，一共发现了68个琉球墓和墓碑，并写下《福州南郊白泉庵琉球墓群遗址调查初记》^②。这次调查，为以后的中琉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时至今日，当年尚存的琉球墓群早已丧失殆尽、所剩无几，人们对几百年来琉球人在福州地区的活动，很大部分是从1963年的琉球墓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上了解的，从而显见历史遗存研究的重要性。就琉球墓调查而言，其意义不同寻常。

众所周知，现存的中国琉球墓碑具有丰富的史料研究价值，从墓碑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当时琉球来华使团中人员的身份、组织名称和来华的目的。琉球墓碑还可以弥补史料文献记载中的不足。尤其是那些在正史或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名声并不显赫的琉球人，诸如船工、水手、役从等，他们为中琉友好关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功不可没，今人能获悉他们的功绩，正是通过一块小小的琉球墓碑而了解他们的。当然，琉球墓碑的作用还不仅于此，通过琉球墓碑，许多后人能追寻到他们的祖先。通过小小的一块墓碑，能够寄托他们对先人的哀思，缅怀先人的业绩。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极好的安慰，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学习先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国家的繁荣，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默默奉献。由此可见，小小的琉球墓碑，有着极为深厚的内涵。

1985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徐恭生教授不懈地努力，前后又对福州地区的琉球墓群进行数次的调查，发现了一些1963年调查所没有发现的琉球墓。迄今，在徐恭生等学者的抢救性研究中，发现的福州琉球墓及碑石已达120余块（圻）。

1980年前后，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朱振声先生对福州的中琉友好关系遗存做了细致的考察，撰有《从福州的几处古迹看古代的中琉关系》一文并发表在《海交史研究》第3期上。该文利用历史遗存来论证史实，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效果。朱振声先生还留有《福州琉球馆六次调查记》遗稿，征得其亲属的同意，我们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以飨读者。

1991年，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关于中琉关

^① 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

^② 收入刘蕙孙：《刘蕙孙论学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系遗址考察的活动，除了在福建沿海地区进行有序的调研外，还派员对琉球进贡使团进京的路线及相关活动进行了考察，收获颇丰。考察人员发现了琉球人在浦城张氏族谱中留下的诗句；琉球人在连云港留有香炉，炉壁上镌有他们的赠诗。在淮阴，发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出使中国的琉球使者郑文英的坟墓；在旅顺博物馆发现了明朝崇祯六年（1633），中国使者杜三策册封琉球时的诏书。这些中琉友好关系遗存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中琉关系研究的空白，而且也订正了研究方面的一些谬误。由此可见，注重历史遗存的研究，的确是历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992年前后，日本冲绳地区的学者为了纪念1392年闽人移居琉球600年的活动，先后有多批的学者来福建调查“闽人三十六姓”的遗存，希望在福建发现“闽人三十六姓”的族谱，发现和“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相关的资料。后来他们寻根访祖，在福州林浦找到了琉球林氏的祖祠，在漳州地区找到了琉球王氏、毛氏和阮氏的祖居地，两地人民重续600年前的亲缘，其乐融融，难以言表。

最近几年，有许多海外学者来福建访问考察，有的研究中琉交往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有的考证琉球古钱币的来源，并试图在福建找到答案；有的学者在福建考察古代陶瓷和砖瓦的制造，从中探寻琉球陶瓷和砖瓦烧制技术是如何受中国影响的；有的学者在福建的农村考察酿酒和线面的生产，他们认为福建的酿酒和线面的生产技术早在明清时期就传播到琉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回顾漫长的中琉历史关系研究的学术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于仅仅利用文献资料来做他们的研究。利用田野调查、考古发现和口述历史等综合性资料，使学术的研究呈现立体的，多层次的，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特点；也使研究的结果更准确，更接近客观事实。

中琉关系史的研究固然有许多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有沉睡几百年的皇家档案，有林林总总的《使琉球录》、《使琉球记》，有卷帙浩繁的史书和实录，也有数不清的方志、文集、笔记小说。然而中琉友好关系的历史遗存犹如散落的珍珠，去收集它，去考究它，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和时间。若用一条金丝将散落的珍珠串起来，那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有关中琉友好关系的历史遗存作一细致的考察，以探讨中琉历史关系中的相关问题。

毋庸置疑，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的研究，首先是有局限性的。譬如日本冲绳地区的历史遗存，笔者未曾实地考察，不免遗憾。幸好许多老师长期在日本冲绳地区做研究访问工作，通过他们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图片资料，

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才得以完成冲绳地区历史遗存的介绍和研究。研究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它不同于其他专题的研究，可以随心所欲，纵横捭阖，任意驰骋。但它却是天造地设，似乎历史巨人已为这篇论文勾勒好框架，我们的笔触可以伸进任何一个角落，将那一段历史再现。大量地使用图片在这一类型的研究中是被允许的，也是必需的。笔者小心翼翼地做这项工作，也许图文并茂的叙述能够弥补研究上的其他不足，衷心希望这一研究得到更多的专家、读者的帮助。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日本冲绳地区、福建地区、进京贡道和北京地区的中琉友好关系遗存做一考察，从不同的角度和类型加以分析，主要从机构、宗教、航海造船、人物、碑刻、墓葬、物品等方面向世人展示中琉友好交往 500 年的历史，并从中探讨中琉友好交往历史的遗存对今天中外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福建地区的中琉友好关系遗存	(1)
第一节 相关的机构与设置	(3)
第二节 福建地区的重要卫所与港湾	(15)
第三节 中琉交往中福州地区的宗教信仰遗迹	(30)
第四节 册封使与福建的关系及其相关遗存考	(42)
第五节 鼓山、乌山的册封使相关碑刻	(48)
第六节 福州琉球墓园	(53)
第七节 “闽人三十六姓”及其祖籍地的考察	(60)
第二章 以福建进京贡道为中心的考察	(75)
第一节 福建进京贡道上的关隘与河流	(75)
第二节 进京沿途墓葬	(88)
第三章 北京地区与中琉关系有关的历史遗存	(92)
第一节 琉球贡使在京的活动范围	(93)
第二节 接待琉球使团的相关部门机构和场所	(103)
第三节 琉球官生与国子监	(114)
第四节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琉球国进贡物品	(116)
第五节 北京通州张家湾琉球墓园	(125)
第四章 日本冲绳地区的中琉历史遗存	(127)
第一节 琉球王朝时代的遗址	(127)
第二节 琉球王朝时期的宗教遗址	(134)
第三节 中国皇帝、册封使臣及其从客的墨迹	(138)
余 论	(159)
参考文献	(166)
图片说明	(174)

第一章 福建地区的中琉友好关系遗存

明初，凡外商入贡皆设有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①。清沿明制，福建仍是通琉球的唯一省份。福建市舶司明初设于泉州，但由于元朝末年的战乱破坏和泉州港的日益淤塞，明成化年间移置福州。从此福州成了中琉交往的重要舞台，琉球贡使团在这里登陆、停留，而中国册封使团也在这里造船、开航。福州成为琉球国朝贡活动的专门港口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福州从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建冶城开始，历为王都、郡治、省会，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省最大河流闽江穿境入海，使其成为福建最重要、最大的港口。其次，由于人民善舟楫，造船业自三国孙吴政权统治福建就一直受到重视，至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时尤为显赫。航海业与造船业相互兼长，福州曾造就了大批优秀的航海人才，正如明册封副使谢杰所云：“大都海为危道，向导各有其人。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由闽以北熟其道者，梅花、定海人；由闽以南熟其道者，镇东、南安人。”^② 再次，又因为福州与琉球国基本纬度相近，航程最短，并且琉球国专司朝贡的长史、通事等多为明初赐给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他们大都是福州河口居民的后裔，与福州有很深的地缘、血缘关系。另则，外交与航海的需要，也使福州成为明清朝贡管理机构和册封琉球使臣的驻地，同时也成为修缮贡船与修造封舟的基地。由于管理市舶提举司的布政司，掌管朝贡事宜的宦官和进贡厂均在福州，“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③，从而促成了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自此，福州成为琉球国400年来唯一的通商口岸。

福州是琉球来华使团的重要活动场所。这里设有馆驿、牙行，它们是琉球使团及其随团商人、漂流难民在华活动的起点与依托。在琉球朝贡过程中，如果顺利，琉球使团只需6~7天便抵达福州近海，经五虎门，到闽安镇衙门

①（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8上《杂论·开互市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明）夏子阳，王士禛：《使琉球录》所附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见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564-565页。

③《明实录·英宗实录》卷58“正统四年八月庚寅”条，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外的亭头怡山江边，等候有关官员的验关检查。检查琉球贡船的事常由福州厅移会闽安协饬令闽安巡检执行，有时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检查完毕。然后护送进城，再经福防同知，会同福州城守营将官以及海关委员一起登船查看执照、贡物、防船军器、土产、银两、官伴人数，如果都与申报数目相符，就算完成了入境手续。来华琉球人员被安插在柔远驿馆居住，其中朝贡正副使、都通事、大笔帖、正副使的使赞等 20 多人再择期北上，其余人员留在福州，或贸易，或学习，等来年进京使团返回福建时，再一同回国。

来华琉球使团在福州停留的时间较长，通常是三月前后到福州，九十月动身进京朝贡，在京停留 40 天左右，再返回福州等候六七月的风信回国。来华琉球使团有二三百人之多，而且琉球来贡次数频繁。据记载，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光绪二年（1876）的 458 年间，琉球遣使入华 469 次，平均达每年一次之多，且大多数成员都留在福州学习和贸易，在这里至少停留一年的时间，与福州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福州成为中琉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有些琉球人在这期间因病不治而葬于福州，福州则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福州也是中国派出册封使团的出发点。他们在此造船、招聘航海人员、祭祀海神、等候风信，做这些准备也颇费时日。以萧崇业一行为例，“万历戊寅春，余以使事，客闽近二载”^①。而夏子阳一行停搁更久，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奉命入闽治舟，“凡三年工始告竣”，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仲夏才得以扬帆远航^②。滞留期间，册封琉球使臣，或访名山古寺，或作吟咏题赠，在福州留下不少碑刻与诗句。闽江流域有许多民间信仰都与中琉航海有关，因此，不少庙宇也留有人们为祈报中琉航海平安而捐建庙堂和塑像的碑记。

明成化年间福建省舶提举司迁往福州之后，闽南漳泉地区以其杰出的航海造船技术和浑厚的宗教文化底蕴，依然与琉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给予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中琉友好交往的历史依稀可见：琉球闽人叶落归根的坟茔、琉球闽裔梦里萦绕的宗族祠堂、中琉通商的口岸、曾建造驶向琉球船只的船场……

我们可以从这些中琉友好的历史遗存中，寻觅中琉历史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①（明）萧崇业：《使琉球录》卷上《重修广石庙碑记》，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74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74 页。

^②（明）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见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第 307 页。

第一节 相关的机构与设置

明清时期的福州，不仅是册封琉球使团的重要活动地点，也是来华琉球人员的主要居住地。接待琉球进贡使团的主要机构有市舶司、琉球馆、闽安巡检司、闽海关等，如今有的已历尽沧桑灰飞烟灭，无迹可寻；有的却保存完好，成为中琉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一、福建市舶提举司

明初的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是专门管理外国朝贡事宜的机构，也是官方控制海外贸易的集中体现。其设立目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得很清楚：“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①与隆万海禁渐开以后的漳州海防馆（后改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民间海外贸易不同，它的职责是，“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②。

明前期设有三大市舶司，它们都是特定的外国朝贡使团的对接口岸。“凡外裔入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州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③，福建是中琉交往的官方指定口岸，其所设市舶司专掌琉球朝贡事务，内设官职有：提举司一员，从五品；副提举司一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④。吏役则有吏、户、礼、兵、刑、工共六名，司二名，典四名，转考、候缺、农民无定数^⑤。此外还设通晓番文、精通礼法的土通事及门子、弓兵等。

福建市舶司的地点，经历了较大的变动。明初原设在泉州城南水仙门内宋市舶务之旧址。泉州市舶司始设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南宋政府视其为重要利源，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⑥但自设后，废置不一，明洪武间恢复，成化八年（1472）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0页。

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5《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8页。

③（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8上《杂论·开互市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官职”，1939年排印本。

⑤（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吏役”，1939年排印本。

⑥（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34《职官部·提举市舶》，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50页。

迁往福州^①。据考，宋元明泉州市舶司遗址在今水门水仙宫鹊鸟桥旁，北有舶司巷（图1）。



图1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明代来远驿则设在泉州南门外晋江边繁华的车桥市（图2），乾隆《泉州府志》卷4《封域》载：“明来远驿在府城南三十五都车桥村，永乐三年建，以馆海外诸国贡使，成化八年提举司移置福州，驿废。”^②



图2 明泉州来远驿遗址

最初琉球船舶于泉州港，由设在泉州的市舶司接待。由于琉球来华直驶福州的航线远比泉州便利，而进京朝贡的琉球贡使即便到泉州后仍要回到福州再溯闽江北上，早在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之前的正统四年（1439），巡抚福建监察御史成规在向明英宗汇报接待琉球贡使的费用时就指出，“琉球国往来

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2《公署》，清同治九年（1870）章倬标重刻本。

②（乾隆）《泉州府志》卷4《封域》，清同治九年（1870）章倬标重刻本。

使臣，俱于福州停住”^①。加上从事琉球朝贡贸易的人员相当部分是明洪武、永乐年间移居琉球的福州人，所以琉球船多停泊在福州河口一带，最后促成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当时的按察司副使林珙所撰的《福建市舶提举司记》一文，详细介绍了该衙门在福州相地迁置的过程：

成化丙戌（成化二年，1466），巡按御史朱公贤奏请迁福之柏衙，制从之。提举罗公伦申云：“衙门设立，自有其地，迁移亦有其数。盖以柏衙僻陋，非可设之地。岁数未穷，非可迁之时。”遂寝其事。甲午（成化十年，1474），巡视都御史张公议将旧司贸易，置澳门都指挥王钦宅，迁本司官吏居之，但卑隘圯坏，每遇庆贺，表笏、龙亭、仪仗权设仪门行事。弘治壬戌（弘治十五年，1502）春太监刘公毅然曰：“吾奉命专制番舶，是司之设，壮中国之等威，其体制不可不隆；耸外夷之瞻视，其门阙不可不丽。”乃谗于镇守太监邓公、巡按御史陈公，相与赞成其谋……乃措货、市材、鳩工，以提举武公名全、运判杨公名瑞董其役。外为重门，中正厅，翼以两厢，案室有堂，溥有室，官吏有廨，共屋七十余间。始事于壬戌（弘治十五年，1502）年九月十五日，竣工于十二月庚申日，武君属此纪其事。^②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建置》载：“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这里提到的市舶太监府与市舶提举司衙署是两个不同的衙门，但都与市舶事务有关。因前者设在福州，对后者具有领导权，但市舶提举司设在泉州，显然不便于指挥与协调，故有成化二年（1466）将市舶提举司从泉州迁往福州之说。巡按御史朱贤的迁司建议被副提举罗伦否定之后，成化五年（1469），因巡抚都御史张瑄再次提请，迁司之事又被提上议程。市舶太监府原设于福州城西南隅的地平寺之东，据《八闽通志》所载，成化五年（1469）以后从泉州迁来的市舶提举司设在都指挥僉事王胜宅^③，与市舶太监府差不多在同一

①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58“正统四年八月庚寅”条，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② （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1939年排印本。括号中的时间系笔者添加，林珙关于迁司的时间为成化十年；但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0《公署》、王应山《闽都记》卷6、万历《福州府志》卷11《官政志三》记载迁置的时间为成化五年；乾隆《晋江县志》卷2《规制志》记载迁置的时间为成化八年；而何乔远《闽书》的记载则有两种时间，在卷32《建置志》中以为成化五年，在卷39《版籍志》中以为成化八年。萨士武、胡寄馨《明代福建市舶司考》一文主张成化十年迁司的说法。

③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0《公署》：“福建市舶提举司在布政司西南，侯官县之西，都指挥僉事王胜宅也。旧置司于泉州，后番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成化五年，巡抚副都御史张瑄奏请移建于此，内有吏目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8页。

个地方，所以清郭柏苍《乌石山志》说，“提督市舶旧衙与福建市舶提举司公署皆在乌石山北麓，织染局即旧提督市舶衙门地也”^①。在《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中，还附有市舶提举司原契购地四至：“东至官街，西至地平堂，南至军人张清等，北至官河。”^②据王铁藩考证：所谓东至官街，即今澳门路；西至地平堂，该寺在怀德坊，即今道山路水玉巷附近；南至张清等军人宅，无考，疑在今营房里二排巷；北到官河，即今玉山涧河沿。^③

但在成化十六年（1480），市舶太监府与织染局互换^④，迁往城东南隅光泽坊，这个位置可能就是高岐所说的“柏衙”。而位于城西南隅澳门桥附近的市舶提举司衙门，于弘治十五年（1502）进行了重建，“初制建立，坚且壮”，“共屋有七十余间”。据嘉靖三十四年（1555）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所载，提举司的内部结构大致如下。

提举司：正厅三间、穿堂二间、中堂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吏户礼书房三间、兵刑工书房三间、仪门三间、屏门一座、大门三间、土地祠三间、荔枝树一株、龙眼树四株。提举宅：客厅三间、中房三间、两耳房八间、厨房一间、宅门三间。副提举宅：客厅三间、中房三间、耳房三间、厨房一间、宅门二座。吏目宅：客厅三间、中房三间、耳房八间、宅门一座、东公廨房六间、西园房三间。^⑤

到嘉靖年间，由于地方多事，办公经费拮据，市舶机构出现衰颓的迹象。先是嘉靖二年（1523），巡按聂豹奏罢“镇守太监及中官之司市舶者”^⑥，市舶太监府寿终正寝。嘉靖二十七年（1548），其地改设察院^⑦，入清以后，相继设为闽浙总督府和镇闽将军府^⑧。与此同时，市舶提举司衙门也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惟市舶提举司衙门建于福，支候款、兵额派于兴、泉、漳三府。

①（清）郭柏苍：《乌石山志》卷4《祠庙·两贤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②（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署舍”，1939年排印本。

③王铁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0《公署》：“提督市舶衙门在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布政司东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5页。

⑤（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署舍”，1939年排印本。

⑥（明）郭柏苍：《乌石山志》卷4《祠庙·两贤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⑦（明）王应山《闽都记》卷3：“察院，其地旧织染局也。国朝成化间改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規制益宏。”清道光十一年（1831）求放心斋刊本。

⑧（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中《坊巷第二》：“镇闽将军署，旧织染局也。明成化间改为提督市舶府，后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規制益宏。国初为总督署，康熙十九年改为镇闽将军府。”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

征解多逃遁，不惟官无以资用，顾役屡墟，无怪其啧啧也。虽有年例银，不敷岁用，然署僻、官贫、俸薄、役稀，恒称贷以应之”^①。因年久失修，署舍“日渐凋落，欲请而新之，度费出惟艰，惟因其大坏者，量捐俸薄葺之耳”^②。其属役也被先后裁革^③，衙门最后于万历八年（1580）裁撤，职权由同知兼领或统归都转盐运司^④。万历十七年（1589），更将废司衙署改为两贤祠，合祀曾在福建市舶提举司任职的罗伦和舒芬。二十二年（1594）又改为“杉洋督捕馆”，但仍保留两贤祠。清初，这一带均遭火焚，遂将空地改为城守营^⑤。

总之，至万历年间，市舶司作为一种专门负责朝贡事宜的机构，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它的职权，为其他部门所分割。但作为琉球贡使团居住的柔远驿与贡物存放的进贡厂，却仍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表现出与市舶提举司不同的历史命运。

二、柔远驿

柔远驿位于今福州市台江琯后街21号。

柔远驿原名“怀远驿”^⑥，生活在明成化年间的黄仲昭在其所著的《八闽通志》中即云：“怀远驿在进贡厂之南，国朝创建，以为番国使臣馆寓之所。”^⑦由于福建是琉球进贡的指定口岸，这所馆驿主要供琉球贡使团居住，入清以后，民间通常称之为“琉球馆”^⑧。福州怀远驿的创建时间不详，据万历《福州府志》所载，可能建于明初^⑨。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期间，在泉州

①（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公养”，1939年排印本。

②（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署舍”，1939年排印本。

③（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属役》载：“冠带土通事，在设四员，嘉靖二十五年革退一员，今只用三员；牙行原设二十四名，各年份不等，革去十九名，今只存五名；看厂并解运方物殷实户，原额六名，已前年分革去三名，今只存三名；看厂园头一名，系闽县均徭内金拨；柔远驿子二名，系闽县均徭银内编金解，赴布政司给领。”

④（明）王应山《闽大记》卷4载：“市舶提举司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万历八年俱裁去，舶事以福州府同知兼领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又万历《福州府志》卷39《官政志二》载：“市舶提举、副提举，吏目各一员，万历八年裁革，事统运司。”（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⑤（清）郭柏苍：《乌石山志》卷4《祠庙·两贤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⑥（乾隆）《福州府志》卷18《公署一》：“柔远驿，在水部门外。明曰‘怀远’，以为琉球诸番国使臣馆寓之所，国朝因之。”

⑦（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0《公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8页。

⑧（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下《郊垣第三》说：“柔远驿，明曰‘怀远’，以为琉球诸番国馆寓之所。内有控海楼，明正德间建，俗名琉球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⑨万历《福州府志》卷11《建置四·驿铺公馆附》：“柔远驿，在水部门外河口进贡厂之南，国初建，为外国使臣馆寓之所。”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城外亦设有来远驿，但由于琉球贡船“多抵福州河口”^①，在前往泉州之前，都要在福州稍做停留休整，官府就在后来“怀远驿”的驿址附近建造临时馆舍。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置福州，便正式在水部门外的河口地区设立了“怀远驿”。因广州也有“怀远驿”，故明万历年间，福州“怀远驿”改称“柔远驿”^②。“柔远”一词，语出《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意为怀柔远方，优抚近地。

嘉靖年间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中记载了“柔远驿”的规模：

前厅三间，两边卧房共六间，后厅五间，两边夷梢卧房共二十七间。贰门三间，两边夷梢卧房共六间。守把千户房两边共十间，军士房二间，大门一间。^③

关于明代琉球馆具体的变迁情况，因史料有限，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研究。清代，福州琉球馆由于战火、自然灾害及建筑设施的老化，曾多次进行重建和重修。根据康熙五年（1666）二月初九日，琉球国王尚质的上奏表文可略窥明末清初福州琉球馆的大致状况：“中有头门、仪门、大堂、月台、左右两旁房舍三十二间，皆备整完固，使贡臣有栖止之地，方物无湿坏之虞，又于附驿旷地周围砌墙，日夜巡逻，使臣民贡使无相混杂，嫌隙不生，和好永固，规制甚弘，体恤至悉也。”^④

自清康熙至光绪年间，福州琉球馆共进行了16次修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7次，分别为康熙七年（1668）、十八年（1679）、三十一年（1692）、嘉庆二年（1797）、九年（1804）、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十二年（1873）^⑤。其中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那次修葺，还由地方政府出示文告，由琉球贡使向德裕等勒石立碑，碑文如下：

钦加知府銜、永春直隶州正堂、署福州南台海防分府、随带加五级纪录十次翁，为出示严禁事：照得太保铺设立柔远驿，原为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至意。凡有琉球人到省安插馆驿，不准闲杂人等擅进骚扰，久经示禁在案。嗣因该驿年久失修，本分府禀奉大宪筹款兴修，现已修造完竣，诚恐附近居民、闲杂人等擅进骚扰，

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0《公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8页。

② 参见李莉：《明清福州琉球馆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③（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署舍”，1939年排印本。

④《历代宝案》第1集卷14，1-14-10号文件，冲绳：冲绳县图书馆校订本第1册，1992年，第464页。

⑤ 参见李莉：《明清福州琉球馆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